

从生命高原上旋起的将军之风

——朱增泉军旅诗歌论

洪芳

(燕山大学文法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系,河北 秦皇岛 066004)

摘要:朱增泉的军旅诗歌有一种脱颖而出的品质,植根于中国当代军旅诗学情景,却又超拔于这一时段的总体诗学氛围。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关键性命题都与朱增泉诗歌构成了一种紧密联系,但是独特的将军气质使朱增泉诗歌在葆有这些特性的同时,又在根本之处与其他军旅诗歌相区别。

关键词:朱增泉;军旅诗歌;将军气质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2-0030-05

朱增泉是中国当代军旅诗坛上一位非常独特的诗人。1987年当他最初的两首短诗《钢盔》和《迷彩服》发表在《解放军文艺》上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他后来会走得那么远。朱增泉与缪斯是不期而遇的。1987年1月31日傍晚,时任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随部队奔赴老山前线,当他登上边关高山极目远眺,喀斯特地貌上连绵不断的绿色圆形山峰触发了他前所未有的激情与冲动,一蹴而就生以来第一首诗作《山脉,我的父亲》。此前他无心写诗,此后他无意成为诗人,他说:“我是军人,不是诗人。写诗,纯粹是我的业余爱好。何为‘爱好’,性情所至,爱之好之,欲罢不能,欲弃不忍之谓也,非‘附庸风雅’之谓也。”^①然而他在诗歌道路上一直充满韧性地前行,从《猫耳洞人》的横空出世到汪洋捭阖的三部长诗系列《奇想》、《国风》、《前夜》,再到放眼寰宇的诗集《世纪风暴》、《地球是一只泪眼》、《享受和平》等。20余年来,曾经共同支撑起80年代末90年代初璀璨炫目军旅诗坛的第二代军旅诗人群渐渐分崩离析^②,“流失”或者转向,朱增泉依然笔耕不辍,推动着中国军旅诗歌的发展。

朱增泉的军旅诗歌有一种脱颖而出的品质,植根于中国当代军旅诗学情景,却又超拔于这一时段的总体诗学氛围。换言之,朱增泉一定意义上是在

与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联系与区别之中显示出独特个性的。中国当代军旅诗歌的关键性命题,诸如艺术话语在政治话语中的突围、军人生命意识的复苏、英雄主义的多元书写等,都与朱增泉构成了一种紧密联系,但他在葆有这些特性同时,又在根本处与其他军旅诗相区别,这种区别也许不能仅仅囿于风格意义上的比较,而是植根于诗人词语中的习性与气息中的生存背景、构架和体悟。朱增泉是一位将军,在滚滚硝烟和生死较量中运筹帷幄的独特经历渗透在他的诗歌之中熔铸为一种特殊的将军气质,这种气质雄阔沧桑同时高远明朗、沉重深邃同时大气昂扬;这种气质使他的诗歌雄阔沧桑纵览万端于一臾,使他的诗歌穿越历史、现世和未来的纵深而抵达哲学境界;这种气质使他的诗歌能够自由上升到让同时期其他军旅诗人难以企及的精神高标。将军气质的呈现在朱增泉军旅诗歌里是以不经意的态势挥洒出来的,这使他成为中国当代军旅诗坛为数不多的以生命进行写作的诗人之一。

一、血光里升腾的超越与辉煌

朱增泉的军旅诗歌是在滚滚硝烟和一片血光中升腾而起的。1987年他奔赴老山前线,在这里亲历战争。对战争事件、战争场面以及战争中军人

^① 朱向前在《军旅文学史论》一书中将共和国军旅诗人分为接力交替的三代,50年代或此前出生的为第二代军旅诗人,他们是新时期军旅诗坛的中坚力量。

收稿日期:2008-12-11

作者简介:洪芳(1977-),女,满族,辽宁鞍山人,文学博士,燕山大学文法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系,讲师,主要研究中国现代诗学。

的描写是军旅诗歌最为重要和最为宏大的永恒主题，新时期以来军旅诗歌对人性意义上的探索首先表现在对战争的重新认识，如果说“十七年”期间军旅诗人对战争的描写大部分是从国家、军队的政治角度出发，注重的是“事件的再现”，战争在军旅诗歌呈现出来的是一种远距离的、高屋建瓴、气势澎湃但缺乏质感而面目模糊的存在背景，其复杂性已被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掩埋在公众视野之外；那么同样是面对战争，新时期军旅诗人则深沉得多，他们不再相信战争中只有满天飞舞的昂扬激越的胜利欢呼声，他们不再停留于就某一场战斗抒发感情，而是将战争和军人生命放在一个更为永恒的人性平台上去打量并将他们还原为最初的面貌。

对战争及战争中军人生命进行还原式的操作在新时期以来军旅诗歌中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来完成。一种是周涛式的悲怆调侃，如《山岳山岳 丛林丛林》：“好得不分你我，就总有一天算总账/先是有些不快，后来因为一些事生气/先是不想再提起对方/后来积压的怨恨越来越深/用冷枪冷炮吵了一阵架/吵着吵着动了手，鼻子流了血/于是各自回家抄起真家伙/‘你妈的，看我怎么收拾你！’/战争开始了。”战争被言说为人类历史长河中不可逃避的荒谬和经验。另一种是刘立云式的冷静摹写，如《红色沼泽》：“从断崖到断崖/是一片红色沼泽/我深陷其中/并且闻见了死水的气息/在那阵啸音响过之后/我的手和脚和其他部位/犹如鞭炮炸开后的碎片/飘落在沼泽地里。”战争被真实而残酷地分解为一系列令人窒息的图景。与这两种方式相比，朱增泉则显得截然不同。

与同时期所有亲历战争的军旅诗人一样，朱增泉从不讳言战争给军人带来的生死考验与残酷折磨，但与其他军旅诗人迥异的是，朱增泉一直试图穿越苦难的事实界限，努力作出一种艰难而富有意义的言说。战争中军人的苦难（极致为死亡）无疑是令人触目惊心的，然而责任感和使命感却使军人能够以担当和决断的生命状态完成对苦难的抚恤和超越。对苦难的担当乃是出于对生存意义的决断，正是通过决断的瞬间，生命崭露出崇高的旨意，决断之后生命仿佛抖落了一件重负，从隐晦不明的境遇中一下子进入到豁然开朗的谐和之境，也许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只要是人格健全的人，其生命必然存在着将人性的完美发挥到极致的可能性，战争为军人生命意义的升华提供了一种极致的可能，军人在对苦难的承担和决断之中体现出生命的庄严与辉煌，作为一名将军，朱增泉敏锐捕捉到了在血

雨腥风之上渐渐升腾而起的军人生命的至大之境，他试图为军人这一特殊人群唱出一首充满新意的赞歌，既无意使个体失陷于整体之中，也无意使个体成为孤立于历史与责任的突兀存在，而是从生命本身拥有的可能性去升华生命的极致之美。

在长诗《猫耳洞奇想》系列之五《火光·血·分婉灵魂的辉煌》中，朱增泉曾通宵守候在战地救护所中指挥医护人员全力抢救一位被炸烂肠子的战斗英雄，这个难忘的场景成为他写作这首长诗的真实素材之一，他用负伤者在死亡边缘被抢救时的模糊知觉“幻化”成诗句：在炸弹轰鸣、血肉横飞的瞬间，喷溅汹涌的鲜血如同“红的火光将我抛上天空/一片轰鸣将我扔进大海/那火光是红的/那轰鸣是黑的”，“火光将我抛起的一闪中/我的剪影一定很美/我死握着生命的枪管/狂射出生命的弹丸/弹丸拖着生命的曳光”，尽管“我”的剪影很美，可是残酷的战争却早已经将“我”拖进了死亡之谷的边缘，“我触礁在生命之海/半个未死的生命/激起狂涛的轰鸣”，“我”在生命之海中苦苦挣扎，“残恋着对生的希望”，飘飞、颠簸、追赶那片红的火光，最后“我”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我发现“一片日出的旭光/红得这般辉煌”，“血的沃土”里重新长出了“我”的郁郁葱葱的生命之树。然而当“我”苏醒之后，“我”却发现自己失去了双腿（这采自另一位伤员的真实素材），生命之海让“我”品尝到了苦涩难咽的滋味，“我彻夜难眠/空荡凄惶，凄惶空荡”，可是“我”没有沦落到悲哀的深渊之中，因为“我”已在“血光照耀的大典”中“分婉了灵魂的辉煌”，于是出现了朱增泉经典式的诗句：“双腿远行去了，我用思想走路。”朱增泉诗歌中这种生命意义的升华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来源于有“根”的“母体”，在“分婉灵魂”的“血光照耀的大典”中“我”看见了“母亲”，“母亲和我一同走在生与死的/断裂线上”，“母亲以她圣洁的血”不仅分婉出“我”的生命，而且在“血光照耀的大典”中分婉出了我“灵魂的辉煌”，全部过程都是“生的庆典与死的祭奠交相辉映”，都是相同的灵魂不屈不挠的执着与追求，历史就是这样延续，不屈的灵魂在生与死的血光之中绚烂盛开，生命中极致的悲壮之美由此产生。

对军人壮美生命的抒写，是朱增泉军旅诗歌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壮美的生命形态虽悲不凄、虽败犹荣、虽死犹生；壮美的生命形态激越高举、巍峨浩荡；壮美的生命形态惊心动魄、气吞万里如虎。壮美的生命形态在朱增泉诗歌中比比皆是，从《猫耳洞人》到《钢盔》、《迷彩服》、《猫耳洞人》、《老兵》、

《我们在雪里行军》等，壮美的生命形态不是以孤立突兀的面目呈现出来，它是人性为依托，是在对人性温暖的承认与尊重的基础上升华而出，如他所言军旅诗要具备“三味”：硝烟味、兵味、人情味^[2]，因此，朱增泉诗歌中壮美的生命形态才会具有最大的可信性和可感性。例如他写一位即将退伍的老兵向新兵《交岗》时的内心感受：“冰冷的钢枪已被握得发烫/枪的脉搏在手心里噗噗地跳/再在怀中抱它一会儿吧/离它而去时/这支老枪也会难受的”，老兵终于把枪支交到了新兵手中，他已经转身离去，忽然“听见那支老枪/在新兵肩头喊了他一声/咽回去的那滴泪/终于热乎乎得滚了下来”，铮铮铁骨男儿的瞬间温软，构成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军营场景。当然，他诗中的人情味充满了军人特有的阳刚大气和高昂乐观，如他描写闷在高温湿热的猫耳洞中身体腐烂的士兵们的《穿绿裙的男兵》：“为了文明地走向死亡/当战斗打响/他们慌忙套上超短绿裙/敌人打退了/他们没有死，于是/双手撩起裙边/像一群秃羽的公天鹅/跳起芭蕾迪斯科/这是光头男兵的一大发明/笑死人。”这是“含泪的微笑”，这是生命在艰难卓绝中迸发而出的超拔力量。

对军人壮美生命形态的关注与体悟，在朱增泉前期军旅诗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从时间序列上这种关注和体悟一直持续到朱增泉从老山前线归来之后的诗作中，并且又将这种关注和体悟拓展到了无所不在的范畴之内，形成了朱增泉诗歌独特的审美意象和审美感动。这与其说是朱增泉的审美习惯，不如说是他的思维习惯，几十年的戎马生涯和挥斥方遒，使他总是能够在惯常事物之中看到生命力量的阔大和刚硬，从而不可避免地在他的诗歌笼罩上浓重的英雄主义气质。

二、穿越现实的硝烟与迷雾

在硝烟弥漫的战争中，人的“非永恒性”存在遭遇更为鲜明、尖锐地凸现出来，“非永恒性”意味着“人的生存证明自己是一种受时间制约的历史性的生存”，人禀有时间性和历史性的双重局限^[3]，对作为战争参与主体的军人而言，这种生命的“非永恒性”尤为残酷，那么在“非永恒性”之外是否具有“永恒性”的根本存在呢？如何在生命存在的有限性之中找寻生命存在的开敞性呢？战争作为一种具体的历史境遇，是否是历史指归所向的必然宿命？人类在这种荒谬而必然的宿命之中如何逃遁？作为一名将军，朱增泉在深沉地思索。他在由其倡导并支持创办的前线《橄榄风》诗报《发刊词》上写道：

“南疆的群山在思索。盘龙江河谷的丛林在思索。猫耳洞人在思索。思索这片笼罩不散的硝烟。”

朱增泉的思索穿越现实的硝烟与迷雾，直指回忆的境地。在他的诗歌中，回忆模式的采用并非基于艺术“创造”的考虑，而只是诗人想象世界中情感流动的必然趋向，欲罢不能，因此朱增泉诗歌中关于历史回忆的书写才会如此浑然天成。《猫耳洞奇想系列》是朱增泉将诗思的触角伸向磅礴雄浑的历史与宇宙的起点。“在戎马倥偬之中，在潮湿漆黑的深夜里，他神游八极，像在阅读人类的血光照耀的大典，激溅起思想的火花铺成满天的霓虹。”^[4]他的心灵在“梦”里探访“沙海染黄的古埃及”、“法老王和金字塔之谜”，追寻“普渡众生”的释迦牟尼、“挥剑决浮云”的秦始皇、“手捧木牍竹简”的孔夫子……。如《前夜》所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埋在“发黑的老土里”的“光荣和耻辱杂陈的编年史”，生命的轮回繁衍，生命之间的刀光剑影与握手言欢的轮回交替，共同构成这部编年史的沉重底色。但战争与和平难道真的就是组成人类历史缺一不可的二元因素吗？就像宇宙中“方”与“圆”紧密相连但是却矛盾重重的组合？《猫耳洞奇想》系列之三《月亮·钢盔·头颅·枪管……》写道：“人之初，是胎盘中的一个圆/所有的人，都和我一样/降生到地上，都从慈爱母亲的胸膛/那温柔的太阳和月亮里/吸吮生命、思维和灵感/却忘了吸吮太阳和月亮昭示的/圆的哲理，圆的思想”，“人的绝顶聪明/竟是从圆的头颅里滋生出方的思想”，“方”是人类强加给宇宙的自我意志，人类在“方”中扮演着掠夺者与被掠夺者、压迫者与被压迫者的角色，于是战争开始了，“哦——战争/你是被切掉一半的圆吗？/像挂在天上的一张弓/在阳光降服暴雨的瞬间幻成的/一道五光十色的彩虹吗？/那彩虹，是大雷雨的后一半吗？/那彩虹，是大晴天的前一半吗？”战争，在朱增泉笔下散发出浓烈的诗性与哲性色彩，它既能满足人类永无止境的贪婪和堕落，也能给人类带来炼狱重生的企盼与可能，它摧毁和平与希望的同时又催生希望与和平。战争与和平互为排斥却又在人类悠远深邃的历史长河中互为扶持，这是永恒的宇宙悖论还是人类无法化解的生存悲剧？

朱增泉的心在历史长河里痛苦地思索，《国风》系列之三《星空》说：“沉重历史是我带血的胞衣/历史很痛苦/我很痛苦。”在他的诗歌中，历史不是破绽百出窘态毕露的待剖析之物，他无意逼问历史叙事中的文本想象；历史也不是在边缘缝隙处曲折诡谲的迷宫，他无意于在历史的枝端末节作精雕细

琢，他惯常于屏息凝视大历史的悠久深远，并在这种屏息凝视中寄寓对人类和民族生存困境的当下和未来追思，他将思索的目光回投到人类共同的母亲——地球，“地球是一只泪眼”，地球母亲“常常抽肩哭泣的”难道不应该使所有人类子孙自躬反省吗？——“谁都在说：爱国/有时为此你争我吵/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不可开交”，“但是尚未学会那句更重要的话：/爱地球”。这既是朱增泉在历史长河钩沉中关于人类生命永恒意义的思索，也是关于人类命运走向的预警，它不仅出于诗人的感知和体悟，更是出于将军的良知与责任。

如果说浓重的历史体悟拉伸了朱增泉诗歌的纵深度，那么想象主体在横向空间中的流动穿梭则撑起朱增泉诗歌横向跨越的艺术支架，横向与纵向的交叉会合支撑构筑了朱增泉军旅诗歌庞大的艺术空间。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现实与未来，战争与和平，个体与宇宙，域外与域内等一系列宏大的主题磅礴浑地交织在一起，引领读者从有限的物理时空进入到无限的心理时空，引发恒久的带有哲理的人生感、历史感和宇宙感。朱增泉诗歌对横向空间的关注主要体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在历史的整体体悟里钩连中外，这在朱增泉诗歌中俯首可拾，如《奇想》、《前夜》、《与叶夫图申科对话》等。另一种方式是朱增泉对现世域外事件的直接关注与抒写，这在朱增泉的诗歌体系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他是一位“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诗人，将军独有的视域使他的诗歌能够超越地域的界限而打量和关注中国之外但却可能关乎人类未来走向的重大军事事件，如《巴尔干的枪声》牵动和震撼着诗人渴望和平的心灵，“哦！和平哟，和平/和平是挂在墙上的/一把音色辉煌的/古老提琴”；诗人也冷静而清醒地去看待军事大国的《裁军会议》，“用计谋去进攻，去削人之兵/手段最最高明”。

三、充满热度的写作

朱增泉的军旅诗歌是一种充满热度的写作，拒绝在迷惘和虚妄中纠缠各式各样的修辞，拒绝将诗歌沦为当下生存场景无意义冰冷的拼凑，充满热度的写作是朱增泉诗歌在恢宏阔大、纵横捭阖的整体风格之下汨汨流淌的深沉底蕴，饱含对人类生命疼痛沉重的关怀。因为它的存在，朱增泉诗歌的恢宏阔大和纵横捭阖才不会沦为凌空蹈虚和矫揉造作；因为它的存在，朱增泉诗歌在引领精神高标上升的同时又总是能够朝向生命中最温暖和最柔软之处出发，刚硬阔大和温暖湿润，精神向度无限向上延

伸和生命向度的无限向内扩展充盈在朱增泉的诗歌中，构成奇妙的组合，它为朱增泉军旅诗歌赢得了持久的生命力和穿透力。

朱增泉的军旅诗歌充盈着深沉的“惦念之情”，“先把自己的心走向别人心里去。自己心走向他人心里，他将会感到他人心里还如自己心，他人心里还在自己心里”^[5]，这是“我心”与“他心”的双向流动，是温暖、柔软和平实的情愫。作为一名将军，他的惦念之情首先辐射为对军人生命深沉炽热的尊重、热爱和关怀，以一颗真诚朴素之心触摸现实和存在，感受有质感的军人生活和军人生命，正因如此，才会在《冬季，我思念天下士兵》，“冬季是思绪结成冰凌的季节/冬季是思绪狂卷成风暴的季节”，冬季是阳光与风暴在大地之上对比最为强烈的季节，正如军人的生命对于战争与和平感知的强烈错位，“人类在战争与和平的魔圈中回旋/士兵们，靠使命感和失落感/感知风云，调节心情”，战争将最直接的后果塞进士兵们的行囊之中，士兵们承担起生命的支离破碎和血肉横飞，挨过了无数死亡之夜，终于迎来了“绿色信号弹”的“腾空而起”，然而“阴冷的战壕，却在他们内心/继续延伸，甚至/比战场上掘得更深”，“死去的士兵，在活着的士兵心里/继续活着；活着的士兵/在死去的士兵亡灵陪伴下/去重找人生”，这注定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不仅因为士兵们“在本国，在家里，在梦里/时时听到凄厉回声”，更是因为“士兵是最容易受人尊敬的人”，士兵也是“最容易被人遗忘的人”，军人生命的辉煌与哀伤错综交织，构成了朱增泉诗歌惦念之情的丰富存在。

如果说士兵在战争中承载了太多关于荣耀与悲壮的生命体验，那么对军人的亲人而言，担负的则是如山沉重的牵挂和悲痛，朱增泉惦念的目光同样投射到这个易被人忽视的人群，早期诗作之一《苏军撤过阿姆河》，其中有一节《桥头立着一群母亲》，描写母亲们立在桥头等待儿子从战场归来（或者已经牺牲永远不再归来），“阿姆河桥头，立着一群母亲/冬季尚未结束，她们在寒风中等待/车队从桥那边隆隆驶来/母亲们抖动着大桥/震碎了阿姆河上的冰层/河水在冰缝间嚶嚶地哭泣”，等来儿子的母亲捧着儿子的脸“看，吻，吻了又看，看了又吻”，没有等到儿子的母亲则“欲哭无声”，“这一天，在阿姆河桥头/复活了许多母亲，死去了许多母亲”，因为“战争无论开始还是结束/永远都是母亲们和儿子们的事情”，没有呼天抢地的痛哭，但军人母亲隐忍中无言的悲哀和苦痛更令人唏嘘长叹。

对于军人以及亲人生命深切的惦念之情，是朱

增泉军旅诗歌写作的一个基本母题,难能可贵的是,朱增泉将这种惦念之情又推向了一个更为广阔的范畴之内,主要表现为对于民族和人类未来命运的深沉忧患,忧患之情是朱增泉军旅诗歌惦念之情的深化,如果说后者是脉脉含情,那么前者则是温软中沉重的疼痛。尽管目前人类已经进入了相对和平的年代,但是种族纷争、局部战争、核大战的威胁,始终就像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把利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掉下来将人类和地球砸得粉身碎骨,人类在脆弱的承诺和互为人质中艰难前行着,朱增泉将军为此忧心忡忡,他提醒人们在花团锦簇中不要忘却来时的道路曾经是一份沉重的震颤。例如《享受和平》说:“二次大战的废墟尚存,战亡者的白骨尚存/从集中营中生还的人,心灵的伤痕已不可能抚平/今天,战争的恶魔又在时时向我们逼近/科索沃远在欧洲,却有五枚精确制导炸弹/突然钻进中国人心中爆炸。”再如《和平鸽》:“每当我看见/在地上蹒跚的鸽子/遥望天空,却不见祥云”,“哦!善良的人们哟/抛撒面包屑和麦粒喂养鸽子/可以喂饱自己善良的愿望/却永远喂不饱/昂起炮口要吃人的战争”。他警示人们地球已经承载了太多的苦难和忧烦,《地球是一只泪眼》写道:“地球是飘在水里吗/为什么每一块大陆的周围/全都是汪洋大海? /哦——地球满腹烦忧/它睁圆了望不断天涯的/泪眼/何时能哭干,这么多/苦涩的/海水?”他以将军的气魄和风度俯瞰众生,不动声色却万事了然于胸,用自己的方式执着地爱惜和守护着具有永恒价值的人类精神,《仰望雪峰》时感慨“人生不可没有仰望/如同江河都向往海洋”,面对《生命高原》“生命必须满载/灵魂之舵/才便于操稳”。

四、结 语

面对朱增泉的军旅诗歌,我们似乎要重新生成

早已经陌生很久的心理承受之重,因为我们实际上是在面对一个言说了庞大意义的诗歌对象。朱增泉以他质朴的写作方式给予我们关于意义的启示至少是这样的:真正的诗歌应该超越术语玩弄的游戏,应该摆脱自我欣赏的媚俗状态,应该从消极诗歌价值和人类精神的扁平面中走出来,应该仰望星空,应该在有热度的个体歌唱中揭示宇宙、历史、理念、生存、死亡和生命等一系列命题的意义。与“诗歌何为”问题相关的是“诗人何为”,真正的诗人应该渴望进入生命并激扬生命,应该不以任何时髦词语作为脂粉沦为潮流的附庸,也许,朱增泉的诗行可以为作为意义揭示者的诗人做一个诠释注脚,正如《书桌》所说:“我的武器是诗歌、思想和情感/向世界发射希冀、忧虑和爱憎/纸笔狼藉,不是撤退迹象/我活着,这书桌就不该是一座荒坟。”

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将军诗人,朱增泉以坚实的一字一行在中国当代军旅诗坛垒筑起一个属于他的高地,虽然有些诗句偶尔经不起逐字逐句的品读和推敲,但是他的奉献力及其诗歌的穿透力与波及力,已经远远不局限于军旅诗界,他以将军的气度引发对于一系列宏大意义,诸如生命、历史、未来、信仰、民族和宇宙等的追问,而这种追问注定是会对中国新诗产生积极意义的。

参考文献:

- [1] 朱增泉. 自序[M]//地球是一只泪眼.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1.
- [2] 朱增泉. 军旅诗“三昧”[J]. 解放军文艺,2003(6):72.
- [3] E. 云格. 死论[M]. 林克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5:29.
- [4] 张同吾. 将军本色是诗人[M]//朱增泉. 地球是一只泪眼. 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369.
- [5] 钱穆. 人生十论[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4.

责任编辑 韩云波

The General Style Rising From the Plateau of Life

—A Study On Zhu ZengQuan's Military Poetry

HONG Fang

(Department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Law, Yanshan University, Qinhuangdao 066004, China)

Abstract: Zhu Zengquan's military poetry has an outstanding character, which is rooted in the Chinese military's contemporary poetry scene, but got beyond the overall atmosphere of poetry during this period. The key topics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military poetry have relations to Zhu Zengquan's poetry, but the unique General's temperament make Zhu's poetry a unique difference from other military poetry, while possessing these features.

Key words: Zhu ZengQuan; military poetry; general temperament